

郑州一座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器

□ 魏青利 任广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制瓷器的国家,地处中原的郑州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烧制瓷器最早的地区。1965年在郑州市铭功路商代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使世人惊讶地发现瓷器的萌芽源自地处中原的郑州地区。汉代亮绿釉陶发现较早,较多,且器型丰富多样,为中原地区青瓷之始,至北魏后期所出的胎体厚重、灰黄色釉的较成熟的青瓷,其间依然还有三个世纪的空隙,中原地区青瓷的发展似乎断了环节,无从用其他器物填补和解释原始瓷器萌芽地青瓷的发展脉络。

2008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铁经济房项目工程发掘未被盗掘晋墓一座,出土了铜器、瓷器、陶器、铁器、银器等各种质地器物19件,这些器物多为西晋时期的典型器,其中3件青瓷罐的出土,更是中原地区西晋墓难得一见。这批青瓷罐保存完好,造型工整,敦厚质朴,为西晋时期典型的器类,其质地细腻坚硬,吸水性弱,胎骨大体成青灰色,底部个别部位呈现褐色,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敲击起来能发出清脆的金石声,内外施有光亮晶莹的青



图二 西晋青瓷罐(M1:10)



图三 西晋青瓷罐(M1:17)



图一 西晋青瓷罐(M1:9)

黄色玻璃质釉,外不及底并留有釉滴,釉层较厚。胎釉结合不紧密处出现脱釉现象。现将情况介绍如下:
均系罐类,依其形态可分为二型。

型 1 件(M1:9)。内外施青灰釉泛黄,外不及底,釉层厚,有气泡,口、颈部有气泡鼓,腹及上有

(下转 51 页)

量、热能利用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但为了保证烧成质量,避免因收缩率不一致而导致瓷器变形,覆烧法采用的支圈也要用同等的瓷土制成。这样,只能一次性使用的支圈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定窑遗址现存的十几座堆积如山的“渣堆”便是明证。在这些“渣堆”中,最多见的就是覆烧常用的“V”型支圈。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定窑“V”型支圈组合式覆烧法的普遍应用是在金代中晚期。定窑在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的同时,也面临着瓷土资源日益减少的危机^[7]。为节约原料,提高工效,工匠们必然会尝试发明其他更为经济的覆烧法,而宽芒口装烧工艺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8]。

宽芒口装烧工艺虽然可以节省原料和工时,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工艺上的要求更加严格,操作上稍有差池,就可能前功尽弃。此外宽芒口从外观上也逊色于普通芒口定瓷,经济效益当不会太显著。因此,宽芒口瓷器产量可能较小,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在金中都宫城遗址范围内,极少发现宽芒口定瓷残片,这也说明了这类瓷器多供民间使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宽芒口定瓷采用特殊的覆烧法烧成,而所谓“支圈仰烧”一说是不能成立的。据北京地区金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定窑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看,宽芒口定瓷的烧造时间并非覆烧早期(北宋晚期),而应在金代中晚期。或许正是在定窑产量大幅增长而瓷土资源日益减少的背景下,定窑工匠才发明了这种更为经济的覆烧新工艺。

绘图 穆建伟

[1] 李辉柄、毕南海《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2期,第1119—1139页。另,叶喆民、刘毅等也有类似说法。见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第八章第一节,第235页,三联书店,2006年;朱凤瀚等编著《文物鉴定指南》,第87—8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由于器坯口沿处甚薄,高温烧成时难以承重。李辉柄、毕南海文中也认为,采用支圈仰烧法,器坯在“烧制过程中容易塌陷而成为废品”。

[3][6] 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第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印花瓷器因模制成型,规格统一,可能不适宜于宽芒口瓷器成型与装烧的需要。

[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图六九—1,彩版1—2,文物出版社,2006年。

[7] 瓷土资源枯竭当是导致定窑最终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8] 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定瓷中,还发现一枚与宽芒口器型一样的瓷片,它未留有宽芒口,却在器身削去一圈釉层,露出宽约2厘米左右的胎体。估计烧成时其上再覆扣一件相配套的瓷器,起到宽芒口一样的作用。此种情况极可能发生在覆扣瓷器的顶层。

(作者工作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北京钢琴厂)

(上接 20 页)

流釉结晶。盘口,直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凹。肩部饰对称桥状四横系,器表印有麻布纹,造型工整,布纹清晰。高21.2、口径9.7、腹径22、底径16.4厘米(图一)。

型 2 件(M1:10、17)。形制相同,大小不同。内外施青灰釉泛黄,外不及底,釉层厚。直口,平沿,斜肩,肩部对称附桥状四系。M1:10,口径4.6、腹径10.8、底径6、高9.3厘米(图二)。M1:17,口径8.1、腹径18.1、底径9、高13.5厘米(图三)。

这3件西晋青瓷罐有胎色不够洁白,釉层厚薄不均,青釉不够明亮且泛黄闪绿,在流釉处呈凝珠状,凝珠处颜色深黑等缺点,与后代的传世精美青瓷器相比,虽带有少许原始的色彩,但已具备了成

熟青瓷的特征。

这3件青瓷罐从釉色、从式样,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确实的物证,虽然郑铁经济房晋墓内出土的这3件青瓷器的产地和窑口尚不能确定,但它们的出现肯定地告诉我们,它们可作汉至北魏间数百年中原地区陶瓷历史的新桥梁,上承汉代青黄釉陶的优秀传统,下启隋唐二代北方的三彩陶。

这3件西晋青瓷的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青瓷发展系列的贯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为中原地区青瓷的发展、变化及与唐代成熟青瓷的关联搭上了衔接之桥。

(作者工作单位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